

內容提要

本書共收19篇文章，論述近現代中日文化關係的重要課題，諸如兩國文化交流樣相、中日翻譯事業、人物思想、日語與漢語關係、當前領土糾紛、文化磨擦及其解救之道等，都作認真的探討，力求深入淺出，適合關心中日友好各界人士及鑽研中日兩國近代史的學者參考。

作者簡介

譚汶謙(Yue-him Tam)

1941年生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及新亞書院通識教育主任，兼任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理事及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主要著譯：

《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
《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三卷等專書。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1/27

Studies in Modern Sino-Japanese Cultural Relations

Yue-him Tam

Focusing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cultural relations, these nineteen essays try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inter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cluding such important aspects as translation, intellectual appraisal, linguistic relations, sovereignty disputes and cultural frictions. Based on his scholarly observation of actual points of contacts, some of which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by other scholars, the author also seeks to offer advi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great nations in East Asia.

Yue-him Tam, who received his doctorat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is senior lecturer of histor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book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Books* (1980),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Books* (1981) and the three-volume series,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hange* (1985). Dr. Tam is also Dean of General Education of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uncil Member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Hong Ko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History (Tianjin, China).

序

香港日本研究所成立至今已屆九年，多年來承蒙各界人仕及學者們不吝賜教及鼎力支持，業務得以不斷發展。

本所爲了更廣泛地與各界人仕分享本港日本學學者的研究成果，除了繼續出版「日研叢書」之外，現更陸續出版「日本學叢書」。

「日本學叢書」創刊斯始，我們特地邀請本港在日本學研究領域上有極豐富成果的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譚汝謙博士，將他多年來研討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的多篇研究論文結集成冊，作爲我們「日本學叢書」的創刊論著。

《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乃譚博士不怕煩絮，重作校訂的專著，全書共三十多萬字，分爲十九篇，深入淺出地剖析近代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焦點和動向，值得讀者細爵。

譚博士於本書中不僅着重實證，更通過實證而得出精闢的見解，使我們進一步理解素被忽視的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實態，尤其突出「善與惡」的歷史背景，成爲本書的特色。藉着對語言、文字、翻釋、領土主權紛爭、教科書問題等的分析，作者促使人們注意到中日兩國雖仍有很多懸疑未決的問題存在，如果兩國人民能夠坦誠理解對方，一切難題，皆可用和平客觀之

態度去消融，將兩國距離縮短。

在對外關係上中日兩國向來主張「求同存異」，亦即堅持採取理智而溫和的態度來解決問題。以我的淺見，譚博士這部大作，必能引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中日兩國異同的地方，使複雜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在讀者前面呈現。

我謹向各位讀者鄭重推薦此書。

香港日本研究所所長 **廖達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謹識

目 錄

序	香港日本研究所所長 廖達新...	1
1. 中日文化交流的探索		7
一、文化的重要性		
二、文化交流的各種樣相		
三、中日文化交流的實態		
(1) 甲午戰爭以前交流實態		
(2) 甲午戰爭以後交流實態		
四、中日文化交流的特色及其成因		
五、中日關係的將來——幾點芻議		
2. 明治日本人的中國觀		54
一、引言		
二、國防		
三、國家形象與自我形象		
四、傳奇與革新		
五、天職和責任		
六、結語		
3. 鑒真座像回國省親的意義		95
一、風月同天，共結來緣		
二、鑒真的啓示		
4. 近三百年中日譯書事業與文化交流		105
一、引言		
二、萌芽期(1660—1895)		
三、過渡期(1896—1911)		
四、發展期(1912—1937)		
五、結語		

5. 中日之間翻譯事業的幾個問題	165
6. 中日譯書目錄編後記	182
7. 內藤湖南的中日關係論	192
一、內藤假說	
二、獨特的共和制	
三、國際共管中國論	
四、文化中心移動說	
五、結語	
8. 屹立在亞洲廣場上的太田耕造先生	224
一、從打開戰後港日文化關係說起	
二、站在亞洲廣場上的政治家	
三、站在亞洲廣場上的教育家	
附錄：太田耕造著(站立在亞洲廣場上)	
9. 日本語言及其與漢語的關係	267
一、日本語體系	
二、漢語的影響	
三、應否廢止漢字？	
四、歐美語言的影響	
五、總結	
10. 晚清的識字教育與日本	287
一、問題的所在	
二、教育改革與日本	
三、語文改革與日本	
四、結論	
11. 明治以後的日語詞彙的變遷	316
一、本文目的和方法	
二、明治以來最常用的新聞詞彙	

12. 現代漢語的日語外來詞及其搜集和辨認問題 328
- 一、問題的提起
 - 二、日語外來詞搜集途徑的商榷
 - 三、辨別日語外來詞的困難與對策
13. 香港日語教育現況及其問題 350
- 一、諸言
 - 二、日語在香港
 - 三、香港社會需要日語的原因
 - 四、中國的日語教育與香港
 - 五、香港日語教學的場所
 - 六、日語教師
 - 七、日語學生
 - 八、課程與教材
 - 九、香港日語教育的難題
 - 十、幾點建議
 - 十一、結語
14. 日本侵略集團為謀奪我釣魚台做了些甚麼手腳？ 377
- 一、美日勾結的關鍵所在
 - 二、捏造證據、用心惡毒
 - 三、國人的努力沒有白廢
 - 四、日本人的堅毅沉潛
 - 五、日本輿論的改變
 - 六、日本輿論轉變的原因分析
 - 七、其他零星活動
 - 八、我們的呼籲
- 附錄：日本就釣魚台問題代表言論選譯
15. 日本支持教科書檢定制度的言論 432
- 一、集粹之郡(鈴木善幸、小川平二、櫻內義雄、三塚博、諸澤正道、高村象平等)

二、答客問之一(鈴木勳)	
三、答客問之二(藤村和男)	
四、答客問之三(時野谷滋)	
五、答客問之四(渡邊茂)	
16. 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問題	454
一、毫無誠意的「日本政府見解」	
二、鈴木訪華與教科書問題死結	
17. 美化侵略戰爭的電影 《大日本帝國》(座談會)	464
一、全是好人的「大日本帝國皇軍」	
二、爲東條和天皇翻案的電影	
三、全是逆來順受的女性	
四、與「愛」無關的戰爭	
五、美化了的侵略戰爭	
六、電影只是冰山一角	
18.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譯序	490
19. 《日本學叢書》緣起	496
跋	502

1. 中日文化交流的探索

一、文化的重要性

今天，承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福岡協會(The Fukuoka UNESCO Association) 及九州・山口經濟連合會的聯合邀請，有機會來福岡出席第二十三屆現代亞洲研究會，向諸位報告〈今後的中日關係——中日文化交流的過去與將來〉，使我感到非常榮幸。在座各位女士先生，或是貴國關西及九州地區的文教界先進，或是工商界領袖，都十分關心中日兩國的關係，而且都對兩國關係有相當的認識，因此我相信在我演講之後的自由討論時間，我將會獲得各位的啓導，謹此先行致謝。我很久沒有用日語演講，日語能力有點兒退化，未必能暢所欲言，各位聽起來也許會感到吃力，十分抱歉，並請原諒。

兩個月前，當福岡聯合國文教組織協會事務局長竹藤寬氏給我掛長途電話商量演講題目時，他強調要我預測今後的中日關係，希望我不要再多講過去。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我認為決定今後中日關係的主要力量，不但來自兩國當前和過去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也來自兩國過去的文化關係。也就是說，要預測今後的中日關係動向（嚴格來說「預測」是不可能的），不能

忽視文化的重要性。這番理論聽來很抽象，但是幸運地獲得竹藤氏的同意，因此題目就這樣決定下來。

真的，我認為在二千多年的中日關係史上，文化交流佔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中日之間的文化關係，在很多地方有別於中日兩國與任何外國的文化關係；甚至可以這樣說，若論對中日全體關係的影響，有時文化比政治和經濟都來得重要。這是中日關係史的一大特色，只要我們細心觀察兩國關係史，不難找到例證。

今年（1982）夏天發生的中國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事件，就是一個好例子。雖然，一個多月之前（即九月中旬），為了鈴木善幸首相訪華，也為了顧全兩國政治經濟的大體，兩國政府就教科書問題上達成了「外交上的決着」，使教科書問題不再成為兩國外交發展的阻力。換句話說，中日兩國政府因為政治的理由暫時平息了教科書的爭議。九月中旬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抗議減弱，不過海外各地的中國人卻繼續抗議活動，這表示政治力量不能徹底解決影響兩國關係的文化問題。

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最積極的是我工作的地方——香港。自從七月以來，香港的抗議活動一直沒有停止。在八月短短的兩個星期之內，竟然能夠收集三十萬個抗議者的簽名。九月十八、十九兩日，舉行萬人集會及推行抵制日貨運動，有數百名大學生用自己的熱血寫成抗議血書，甚至有一些激動分子將憤

怒訴諸暴力行動，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和日資大丸、松坂屋等百貨公司放置炸彈。有人形容這兩三個月是繼1967年大騷動之後香港人情緒最激動的期間，可見香港人心底裏是如何重視文化問題的了。

如所周知，近二十年來，日本成為香港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香港人都知道維持香港的繁榮必須仰賴日本的合作和協助。但是，這樣重要的經濟理由仍然不能阻止香港人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

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文化的執着和重視，有時是會超越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有些日本人認為中國人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就是干涉日本的內政，就是不友好的行為。如果這些日本人理解中國人執着於文化的深意的話，以上的誤會便會消除。

中國人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其動機是要求今天的日本人尊重歷史，不要忘記歷史；只有時刻記取歷史的教訓，反省自己的作為，才能防止軍國主義的復活，兩國才能和平相處。因此，中國的抗議並不是為了干涉日本內政，而是為了中日之間千秋萬世的友好事業。前幾天（十月二十四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北京接見日本公明黨竹入委員長一行時所說的一番話，清楚地反映中國人的想法：

我們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因為教科書與下一代的教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有些教科書之所以成為問題，

就是因為向下一代灌輸軍國主義精神。這是關乎世世代代的問題，所以我們喚起日本注意由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擾出來的風波。我相信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和大部分政府官員都不贊成復興軍國主義，所以從前出現三島由紀夫一類事件，也只是孤立的事件。最近，日本有些著名的政治家竟然倡議興建「滿州國建國之碑」，真是居心叵測。這些事情對後世都有所影響。①

鄧氏所說的「世世代代的問題」，其實與我所說的「文化問題」相通。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對兩國全體關係的定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會如此。

二、文化交流的各種樣相

在討論中日文化交流之前，首先讓我們看看世界史上一般文化交流的形式。「文化」的範圍很廣，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知性的、道德的、情感的生活）上的事情。因此，兩種文化的「交流」，不一定是自然而然的現象，必須經過人為的努力。在世界史上較為普遍的文化交流的樣相有以下幾種。

第一，不平衡的交流。文化發達較早的希臘與隣國的文化關係就是不平衡的交流，因為只有希臘文化向外「單流」。外國文化極罕「回流」，例證之一是古代希臘人很少從事翻譯工作。這種不平衡的、一面倒的文化關係，不全是古代交通困難

的結果。即使是在現代日本文化交流史上，也常常見到不平衡的現象。例如，日本從阿剌伯國家引進不少文化（阿剌伯數目字和文學等），但回流到阿剌伯國家的日本文化為數甚少（如果不計日本製汽車或電器用品的話）。這一類不平衡的交流方式卻是世界文化關係史上的主流。

第二，不自主的交流。文化交流能夠豐富人類的文化生活，所以古往今來各國出現許多交流的使者，發生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意大利的馬可孛羅、日本的空海和阿部仲麻呂、中國的唐玄奘和鑑真大師等。不過，世界史上不少文化交流是不自主的交流，甚至是被迫害的結果。增田義郎說：

當某一文化擴大到相當程度，便會與其他文化接觸，向其他文化傳播，必然引起軍事征服、屠殺、暴政、破壞、大規模的社會變動，這是世界史上的通例。和平的、美好的、乾乾淨淨的文化的傳播和融合原是罕見的事。當某一文化發生大規模的有力的變化時，其背後大都充滿浴血的鬥爭、征服者的強制、被征服者無條件的屈服等等。②

上述情況常常出現於殖民地的文化史。日本與美國的文化交流史——從培理提督到麥克阿瑟將軍——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不自主的交流。

第三，不全面的交流。不論是平衡的或一面倒的交流，甚

或是自主或被迫的交流，通常都是局部的、片面的交流。前面提及的日本與阿剌伯國家的文化交流，不但不平衡，而且不全面。日本人都會使用阿剌伯數目字和石油，但能夠通曉阿剌伯語言、文學乃至政治經濟的，恐怕是屈指可數的中近東研究專家。相反亦然，精通日本文化的阿剌伯人一定是少數，一般阿剌伯人恐怕只會使用日本製的汽車和電器用品。

以上所列「不平衡」、「不自主」、「不全面」的樣相，就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一般樣相。讓我們重複增田氏的話，總結不幸的世界文化交流史的特色：「和平的、美好的、乾乾淨淨的文化的傳播和融合原是罕見的事。」

三、中日文化交流的實態

知道了世界文化交流一般樣相之後，當我們回頭考察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史，我們不期然地感到這段歷史的可貴！

衆所周知，中日文化交流史非常悠久，範圍非常廣濶，對兩國本身文化的發展都曾產生非常鉅大的影響。限於時間，我只能粗畧地以中日甲午戰爭（1894—95）為分水嶺，將中日文化交流史劃分為兩大時期。甲午之前，日本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甲午之後，情況逆轉，中國通過日本大量吸收西洋文化，同時也大量吸收日本文化。雖然，日本吸收中國文化較早，時

間較長，吸收量也較大；不過，近百年以來，中國吸收日本文化的廣度和深度，也是不容忽視的，更何況日本是今日中國吸收先進科技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哩！

(1) 甲午戰爭以前交流實態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日兩國人民就剝木為舟，冲破驚濤駭浪，開始友好往來。正式往來可從公元三世紀算起。據《魏志》記載，日本使者來魏四次，魏使赴日則有兩次。公元589年，隋文帝統一中國之後，隋日交流日益頻繁。唐代（618—907）的交流更加超越前代。在二百八十餘年中，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其中三次不成功），非官式的入唐團體6次，合起來共25次之多（確實次數有爭議），即約平均12年一次。一千多年前，遠洋航海不但花費時間（來華一程約需時兩三個月）和金錢，而且十分危險。上述入唐次數可算是十分頻密的了。為了確保安全及珍惜入唐機會，「遣唐使」規模宏大，小的一二百人，有時多達六百餘人，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尚有留學生和學問僧，還有醫師、畫師、樂師、琵琶演奏者、圍棋高手、船夫、工匠、射手、保安人員、翻譯人員等，通常分乘多艘大船，互相照應，聲勢浩大。對日本文化曾作重大貢獻的吉備真備、橘逸勢、高向玄理、南淵請安、以及學問僧空海、最澄、圓仁等，都是曾經隨同遣唐使來華的人。③

公元 894 年起，由於唐朝內亂等原因，遣唐使制度正式廢止。不過，此後數百年間，通過民間的努力，中日之間文化經濟交流不絕。即使在厲行「鎖國政策」的江戶時代（1600—1868），亦不例外。從 1603 年至 1707 年的一百年間，江戶幕府規定每年只准荷蘭船二艘入境，但中國船則准 30 艘。可見當時日本的對外貿易是以中國為最主要的對手。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也不斷吸收中國文化，輸入八千多種漢籍。據一項估計，清代出版的漢籍，就種類而言，十之七八輸入日本。^④

江戶幕末開國（1854）之後至甲午戰爭約四十年間，日本不但從中國輸入中國文化，而且通過中國輸入西洋文化，大大促進日本的現代化。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尚在開始階段，讓我較為具體地說明一下。

首先是日本人翻刻和翻譯了不少有關西洋文化的漢文書籍。第一批大都是西洋傳教士用漢文著譯的書籍，例如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坤輿萬國全圖》、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坤輿外紀》、裨理哲（Richard Way）的《地球說略》、理雅各（James Legge）的《智環啓蒙塾課》等。其中理雅各的書原是英漢對照的英語教科書，香港英華書院 1864 年出版，似乎並無特別過人之處，可是初版後三年（即 1867 年，明治前一年），日本便出現「訓點本」；1872（明治五）年及 1873（明治六）年，先後出現多種英日對照本，在

日本各地學校廣泛使用。⑤

第二批大都是中國人根據西洋書籍譯著的漢文書籍。例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等。其中魏氏《海國圖志》對日本影响最大。該書是魏氏據英國人梅理（Murray）氏《地理大全》所編譯，成於1842年，成為近代中國最早介紹近代世界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鉅著。該書有三種版本：1842年50卷本、1847年60卷本及1852年100卷本。魏氏在這部鉅著中不但介紹西方科技成果，而且論述抵抗西方侵畧的策畧，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這部鉅著在中國只是引起少數士大夫的注意，但卻深受在美國黑船之前驚惶失措的廣大日本武士的熱烈歡迎。據鮎澤信太郎統計，從1854年（美國海軍提督第二次抵日強迫開國）到1856年短短三年間，日本翻印及訓解《海國圖志》不同的版本（均是部分翻刻）竟然多達二十多種。⑥ 據我主編的《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在差不多同時，《海國圖志》的日文翻譯本（也多是部分翻譯）共有16種，⑦ 幕末志士如佐久間象山、吉田松蔭、橋本左內等人深受魏源所影响。⑧

除了通過漢文圖書輸入西洋文化之外，旅日華僑和不少中國技術人員為日本引進很多先進的科技項目，有力地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工作。有關旅日華僑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蒲地典子（Noriko Kamachi）教授已經作出初步的評價。⑨ 我自